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乐此不疲集

张岂之自选集

张岂之◎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ECIBUPI JI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张岂之◎著

乐此不疲集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张岂之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此不疲集:张岂之自选集/张岂之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761-7

I. 乐… II. 张… III. 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4205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LECIBUPI JI

乐此不疲集

张岂之自选集

张岂之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喜崇爽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1
字 数 349千
定 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汤一介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何兹全 宋贵伦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黄枏森 龚育之 童庆炳
满运来 蔡赴朝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常 卫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史秋秋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文启 张兆民 孙向东 杨学军 陈 鹏
陈之昌 陆 奇 辛国安 庞 微 单允茹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卢颖华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陈平原 陈 来 陈雨露
郑红霞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崔新建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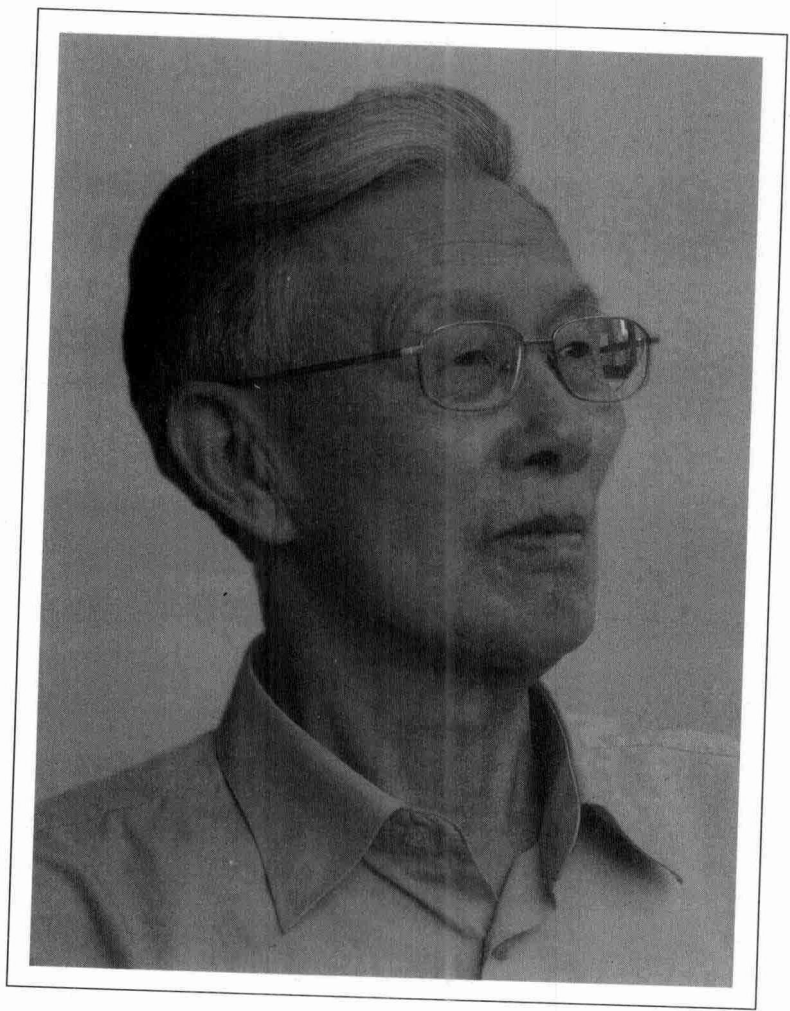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9年11月



张岂之先生

在人文学术园地耕耘

——张岂之先生访谈录

湛风：张先生，您好！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研究》，从2008年第3期开始设置了学人访谈栏目，该刊编辑部主任段江丽女士专门打来电话，说2008年底已经向您约请了做访谈的计划。考虑到您的方便，她特别委托我们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以便满足读者朋友的愿望。

张岂之：是有这回事。但是因手头有不少事情要处理，将这件事忘了，有些愧对段主任。近期她也向我专门提及过。这也是一个有益的交流机会，我在治学中，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是可以为你们和其他读者朋友作参考的。

郑熊：我们着重向您请教五个方面的问题。

张岂之：请你们提问题吧。

北大足迹：难以抹去的记忆

湛风：张先生，我们很早就读到您回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的文章。在细腻文笔的深处，让人能感受到您对当年高校治学环境的

珍惜，给人以启发。一些不甚被人们注意的历史掌故也经由个人独特的视角而鲜活起来。您当时是如何步入北大的，北大的学习生活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有哪些影响？

张岂之：谈起来话就长了。1927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清末状元张謇的故乡是南通，经由他的倡导和践行，南通市的实业和教育比较发达。我有幸在那里读过小学。由于日军侵华，故乡危在旦夕，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经过千辛万苦向后方转移。我在陕西城固读过初中，后又在重庆读南开高中，在这里沐浴于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阳光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北平联合招生。我读高中时受课外书的影响，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或史学。我赶到古城北平，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被录取。秋冬之际（开学晚了），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新生在北平沙滩的红楼和北楼听课，我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1946年至1950年夏）。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我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汤用彤、朱光潜、杨振声、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讲课，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数十年过去了，我在母校哲学系读书的情景，一直刻印在自己的心上，越是年久，其印象越是鲜明，弥足珍贵。我从这些图景中吸取精神的力量。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们，他们的身教言传一直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在我看来，北大之所以称为北大，是因为作为北大灵魂的老师们有着高尚的人品和学品，薪火相传，谱写了北大的光辉篇章。1946年至1948年北大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尽管他公务繁忙，但每学期都要抽出一些时间给文学院的同学讲演。当时他讲《水经注》，介绍他的治学方法，我每次必听，受到一些启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大文学院请马克思主义学问家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何干之、艾思奇等先生来讲学，特别是外庐先生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给我很大影响，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是我走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引路人。

湛风：20世纪50年代以后，您曾经长期担任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助手，接受专门的思想史研究训练，并承担了具体的学术研究任务，或许当时就是一种机缘。

张岂之：是的。人生就是这么微妙。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下如此深厚的情缘，尽自己毕生努力，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但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0年我从北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并入北大，这时，外庐先生已经在西安就任西北大学校长，他要我和我爱人（我们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一起去西北大学任教。1952年底，我们到了古城西安。几十年来，我主要在西北大学任教，主持这里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尽管上个世纪也有不少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做外庐先生的助手，做一些学术研究工作；近十年来经常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做些研究。

郑熊：当时北大的著名学者很多，您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所说明。在北大读书期间，还有哪些学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岂之：还有不少学者，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感召人的力量。比如当时哲学系的年轻老师任继愈（讲师）、齐良骥（副教授）和石峻（讲师）三位先生。

我在大二时选读了任继愈先生开的选修课《隋唐佛学》，选读的学生只有五位。在我的记忆中，任先生没有请过假。我每听他一次课（两小时），都有收获。他不仅介绍中国佛教史料，而且在讲课中着力引导我们从史料中抽绎出观点，使这门关于中国佛学史的课具有了一

定的理论性，促人思考。这种重视理论分析的治学方法，不是停留于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内容的复述，而力求提到宗教哲学思想的高度进行提炼分析，这对我毕业以后研习中国思想史做了很好的准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任先生不仅是这门课程的老师，而且是我课外的指导教师。这不是系上的安排，当时北大哲学系本科生并不实行导师制。我主动向任先生请教：我是否可以着手阅读关于中国佛教的典籍，任先生劝我暂缓，要我先读先秦诸子书，有了这个基础，才便于研习其他。于是我开始读先秦诸子，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这些都经过任先生的批改，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要我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我不知道当时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是否有今天所谓“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在我的记忆中，教我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

齐良骥先生开出选修课“英文哲学名著选读”，某个学期只有我一个选读，系里没有因此而停开，齐先生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他对我说，上课时到他家中去听课，这样查书会方便些。齐先生将选读的英文哲学名著（节选的）给我，要我在上课前准备，上课时和他讨论。齐先生通过讲授洛克、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哲学著作的某些部分，指引我一种研究的方法。他说，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首先要把哲学家们使用的概念、范畴研究清楚，然后解剖其哲学思想体系，把握住他们的哲学思想特色，进而理解他们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每次上课，齐先生都要给我提出一些问题，有些我能回答，有些则无言以对，但齐先生从来没有责怪我，他循循善诱，培养提高我的自学能力，我逐渐觉得听齐先生讲课是很有质量的学术熏陶。后来，课程结束不久，齐先生给我一张字条，问我他的讲课有哪些不足，他准备改进，并说，如果他的健康允许，他希望有机会能开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

专题课。后来齐先生因身体欠佳，一直没有开出这门课来。他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因而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齐先生。

在1946年至1948年间，石峻先生每年都开出“伦理学”的必修课，涉及中、外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他讲课的风格和任继愈、齐良骥先生不同，热情奔放，随时发挥，使学生们觉得天地开阔，但也有一点副作用，就是石先生讲课时乡音（湖南口音）颇重，语速较快，有些话学生们听不清楚。我想出一个补救的法子，把听不懂或不清楚的地方归纳成几个问题，给石先生写了一封短信，请他抽时间给我点拨一下。某次他下课要我暂留片刻。他给我几本书，里面夹着纸条，叮嘱我仔细读一读有关的段落。我照着做，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过了几天，我把书还给石先生，并表示感谢。石先生说：“你还想读哪些书，请到宿舍找我。”当时他的宿舍在沙滩北大红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到处是书，我选了几本，写了一张“借条”，石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借条，你看毕还我就是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师生间的这种互信更加宝贵吗？

湛风：这种师生情谊的确令人神往，有君子气象。后来您在治学和演讲中，反复强调要中西贯通、古今贯通，这种学术主张在当时北大是否普遍呢？

张岂之：是的。当时北大的教授有不少是古今、中西融通的典范，如汤用彤、贺麟、冯至、朱光潜等。冯至先生精研德国文学，但他对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也有研究。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的成就，他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深厚的修养。贺麟先生对中国宋明理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很有功力，但是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家。他为学生们开出“西方哲学史”必修课，

又开出一门选修课“黑格尔哲学”(在贺先生之前,张颐老先生曾经开出“黑格尔哲学研究”专题课)。1948年选读贺先生“黑格尔哲学”课的,共有五位学生:杨祖陶、杨宪邦、陈世夫、梅得愚和我。贺先生的讲课方法很有创意:他对黑格尔哲学作了简要介绍以后,要求我们直接接触黑格尔的原著,指定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英文译本)。当年贺先生已经把《小逻辑》译成了中文。他要我们分工将他的中文译稿对照德文本和英文本“加以校正”,或者提出问题讨论。这样的讨论每周抽出一个晚上来进行,不在教室,而在贺先生家中的小书房内。每次去,贺师母为我们准备了茶水,贺先生的女儿亲切地称我们“叔叔”。开始我们对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本提不出什么意见,因为我们对《小逻辑》尚未通读一遍。经过贺先生的启发,我们对《小逻辑》的思想体系有了一些理解以后,我们讨论贺先生的中译稿时,才有话可说并展开争论。贺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些发言对他校正《小逻辑》译稿有帮助。后来贺先生的《小逻辑》中译本正式出版,他在序言里提到我们五位同学的名字,简要地叙述了当年讨论的情况。应当承认,这种教学的方法,是真正启发性的。贺先生采用这种方法来培养教育哲学系的本科生,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五位中的一位杨祖陶从此下决心长期研究黑格尔哲学,他后来成为这方面有影响的专家。还要提到,我们五位和贺先生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而且有着很好的个人情谊。贺先生把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日记给我们看,袒露他当年的思想见解和个人生活,仅此一事足见贺先生对我们的信任。这十分难得,要知道,贺先生当年是北大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已有成就,而我们则是毛头小伙,在人生道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韧的追求：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启示

郑熊：张先生，您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学生，在您看来，侯外庐先生学术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张岂之：我想从当前谈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面临“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是从现在开始，前辈学人早已在这方面开始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他研究成果中最宝贵的，就是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特点，不生硬套用西方的模式。比如侯外庐先生曾经下工夫研究马克思在探讨以印度为主的东方社会时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学人注意到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重要论断。侯外庐先生经过研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历史阶段（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古代文明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有古典形态，还有非古典形态。古代希腊属于前者，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属于后者。这二者的差别，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则是“改良（维新）的路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和希腊不同，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残余，主要是氏族血缘组织的残余，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逐步演变形成血缘的宗法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和思想。

郑熊：在上个世纪，侯外庐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是创新的学术观点？

张岂之：是的。即使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这个观点也是创新观点。经过几十年，今天我国考古学已有很大发展，学者们对中

国古代社会已有了比过去更加充分的认识。有一点，就是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氏族贵族统治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研究，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这里我想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是有独立见解的学术著作。

湛风：当上个世纪40年代，侯外庐先生提出并阐扬这个观点的时候，他自己有怎样的感受？

张岂之：这个问题提得好。在20世纪40年代，当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时，他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感受：“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这就是创新，也就是在科学上找到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特点的一种学术自豪感。

湛风：我记得，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路？

张岂之：是的。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研究，他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这样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侯外庐先生认为，只有一个社会的系统法典，才是社会性质的全面反映，这是稳定化、整体化并用国家强制力量予以保证的生产方式定型的表现。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法典化标准，侯外庐先生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诞生定位于战国末至秦汉初。

我认为，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法典化研究，很有理论价值。他注重整体的历史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脉络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研究他的学术贡献，并不是在具体观点上的继承，

而是在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上的继承，特别要学习他勇于探索创新的治学精神。这是什么方法？简言之，就是历史比较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都有所论述和具体运用。

湛风：关于侯外庐先生“独立自得”的研究精神，您还有哪些补充？

张岂之：我想着重提到《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从写作、出版、修订、再版，历时较长，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到60年代，正值社会激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外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在生活动荡中，承受各种压力，坚持学术研究，完成了卷幅很大的著作，这个劳绩对于后来者是有很大激励作用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思想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正当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学术文化研究备受重视，人民出版社决定改版重印《中国思想通史》，这既可告慰前辈学人在天之灵，对后来者则是有益的鼓励和鞭策。侯外庐先生等的《中国思想通史》，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力求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精神，对中国思想史的内涵、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每卷“绪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外庐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独到见解，并由此入手去解剖中国思想的演变历史，力求触到思想史的实质。这里我需要说一句：虽然我随外庐先生学习研究中国思想史，但是我没有完全学好，因为我对中国社会史没有进行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只能引用学者们的已有成果。

郑熊：在我国史学界有“侯外庐学派”这个称谓，您是怎样看的？

张岂之：这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一起工作，其中有杜守素、赵纪彬、邱汉生和白寿彝。他还一直热心地培养研究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年轻学人。学派的形成，不在于著

述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外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韧的追求》第3章《中国思想史的撰述》中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共事的情况，十分令人感动。他这样说：“我和我的同志们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样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我想，沿着前辈学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继续建设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后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湛风：侯外庐先生奠定和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并促使“中国思想史”形成为一门自觉的新学科（专门史）。他在《宋明理学史》序中对思想史作了一些界定，您以后在此基础上，也作了进一步扩充，其中有明显的薪火相传的印记。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与侯外庐先生的关系的？

张岂之：前边我已提到，侯外庐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术的领路人。虽然历经风雨，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这个学术岗位。今天，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但是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注意历史比较方法的具体运用，依然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现在注意的人并不多。许多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论著，大体上是从概念、范畴方面进行分析，在这一点上有成绩，但是探索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则相对滞后。

湛风：您这一代的学者经历曲折，有些是难以求全责备的。作为学人，不断反思和总结，却给我们后学以启示。您能否扼要地概括您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体会？

张岂之：在治学道路上只有看到不足，才能有进步。关于什么是思想史，我在《中国思想史·序》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意识的发展史。”在我的认识中，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中国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中国思想史也有特色；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特色，我国前辈学人已有认真的研究，其成果可参考引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对它们既可做分门别类的研究，亦可进行综合研究。不论如何研究，追求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双管齐下：中国思想史研究与普及

湛风：我们注意到您主持的一些项目中，既有科学研究类，也有教材普及类，您是如何看待科研与普及的关系的？

张岂之：这是一个常新的话题，虽然学人们都清楚二者需要有机结合，但落实在行动中确是不容易。在有的地方，教材被另眼相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提高教材钻研和质量的积极性，当然，这种教材是建立在科研基础、反映编者学术心得的教学用书。关于学术的精深研究与学术的普及工作，学者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我的浅见是：学术的精深研究是基础，没有这一环节也做不好普及工作。精深研究的成果加以疏解，使更多的人有所了解，这也是必要的。在大学做教师，需要进行科研，也需要关注教材的编写。

郑熊：在人文学科领域，研究团队与单兵作战有无优劣？

张岂之：似乎很难笼统评价。但是，人文学科的团队协作、做一